

欧 亚 学 刊

第六辑

EURASIAN STUDIES

余太山 李锦绣 主 编

梅维恒(Victor H. Mair) 芮传明 特邀主编

中华书局

谨以此辑纪念翁独健先生(1906—1986)诞辰一百周年

TO THE MEMORY OF PROF. WENG DUJIAN

本学刊出版得到梅维恒教授(Prof. Victor H. Mair)
及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学科建设项目经费资助

名誉顾问:季美林 唐德刚

总 顾 问:陈高华

顾 问:定宜庄 韩 升 华 涛 蓝 琪

厉 声 李勤璞 林梅村 林悟殊

刘欣如 刘迎胜 卢向前 罗 丰

马小鹤 牛汝极 潘志平 荣新江

王 颀 王邦维 王希隆 王 欣

魏存成 徐文堪 于志勇 朱学渊

特邀主编:梅维恒 (Victor H. Mair) 芮传明

主 编:余太山 李锦绣

副 主 编:聂静洁

《欧亚学刊》第 6 辑
古代内陆欧亚与中国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

目 录

试论中国早期“胡”概念之渊源	陈健文
Horse Sacrifices and Sacred Groves among the North(west)ern People of East Asia	Victor H. Mair
Images of the Hephthalites in Sino-Sogdian Art	Mao Min
On the Meaning of the Dragon in the Paintings at Afrasyab (Ancient Samarkand)	Matteo Comparati
摩尼教神“净风”、“惠明”异同考	芮传明
唐代“胡人”图像初考	刘文锁
袄教内婚及其在唐宋社会的遗痕	张小贵
古代蒙古的饮金为誓	党宝海
关于法显的入竺求法路线——兼说智猛和昙无竭的入竺行	余太山
吐火罗与挹怛杂居考	马小鹤
北朝隋唐粟特人之迁徙及其聚落补考	荣新江
Description of the overland way to China in Hudud al-‘Alam; dates of underlying itinerary.	Pavel B. Lurje
New data on an early Arab attack on China	Shamsiddin S. Kamoliddin
Who was Apa Tarkan during the reign of the Eastern Turkic Kaghanate in Mongolia?	Takashi OSAWA
蒙古与高丽的战争	乌云高娃
赵衍父子与耶律家族——兼谈元代的卢龙赵氏	刘晓
四卫拉特联盟的形成	青格力
论清朝统一新疆对中亚的意义	贾建飞
17、18 世纪朝鲜对清的危机意识及其克服	李花子

Eurasian Studies

Vol. 6

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ncient Central Eurasian and Chinese Civilizations, Vol. I Contents

Chen Jianwen	The Origin of the Perception of “Hu” in Early China
Victor H. Mair	Horse Sacrifices and Sacred Groves among the North(west) ern
	Peoples of East Asia
Mao Min	Images of the Hephthalites in Sino-Sogdian Art
Matteo Compareti	On the Meaning of the Dragon in the Paintings at Afrasyab (Ancient Samarkand)
Rui Chuanming	On the Manichean Gods Jinggeng (“Living Spirit”) and Huiming (“Light Mind”)
Liu Wensuo	A Preliminary Analysis of the Images of “Hu” in the Tang Period
Zhang Xiaogui	The Traces of Zoroastrian “Khvaetvadatha” Practice in the Tang
	and Song Periods
Dang Baohai	Drinking Gold: An Oath Ritual of Ancient Mongols
Yu Taishan	On Faxian’s Route of Pilgrimage to India and the Journeys of
	Zhimeng and Tanwujie to India
Ma Xiaohe	The Native People of Tokharistan and the Hephthalites Living
	Together

Rong Xinjiang	Migrations and Settlements of the Sogdians in the North-
ern	
	Dynasties, Sui and Tang Periods
Pavel B. Lurje	Description of the Overland Route to China in Hudud al-
‘Alam:	
	Dates of Underlying Itinerary
Shamsiddin S. Kamoliddin	New Data on an Early Arab Attack on China
Takashi ŌSAWA	Who Was Apa Tarkan during the Reign of the Second
	Eastern Turkic Kaghanate in Mongolia?
Wuyungaowa	The War between Mongolia and Korea
Liu Xiao	Zhao Yan, Zhao Tianmin and Their Contacts with Yelü
	Clan,
	with Additional Remarks on the Zhao Clan of Lulong dur-
	ing
	the Yuan Times
Qing Geli	The Formation of the dörben Oyirad Coalition
Jia Jianfei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Unification of Sinkiang in Qing Dy-
nasty	
Li Huazi	Crisis Consciousness Concerning the Qing in 17 th -18 th -Cen-
	tury
	Korea

试论中国早期“胡”概念之渊源

陈 健 文

“胡”在中国历史上是个相当重要的异族观念，在语意上特别专指中国北方及西北方的异族。长期以来，有关胡、汉之间的互动，以及胡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一直是东西方历史学界共同关注的焦点。本文尝试从西周至汉代的文献去探索中国“胡”概念的早期型态，分析“胡”字所指的对象及文化内涵。“胡”字在战国之世开始用来描述北疆异族，在此之前，虽然有学者认为西周金文中的“𠂔”字即是“胡”^[1]，但此时期的“胡”是否就是后来在战国之世活跃于中国北方的胡人，目前尚难成为定论^[2]。从早期文献上来看，胡有两种指涉，一是作为北疆异族的新称号；另一种是做为一种地域概念，指的是胡人所居，或为胡人所控制之地域。

一 “胡”字作为北疆异族名称之始

胡的名称，内田吟风认为始于春秋末战国初^[3]。《逸周书·王会篇》中曾提到有“东胡”及“豹胡”之族称^[4]。不过《逸周书》的成书年代当是战国时期^[5]，因此胡字的出现不应因此而提前。春秋时代，中国称外族之见经传者，曰戎狄蛮夷而已，至于春秋之末，战国以降，胡字之引用始多^[6]，于是胡与匈奴之名，始见于战国之世^[7]，这在早期文献中已很清楚。如：

《周礼·冬官考工记第六》：“胡之无弓车也，非无弓车也，夫人而能为弓车也。”^[8]

《战国策·燕策一》：“苏秦将为从，北说燕文侯曰：‘燕东有朝鲜、辽东，北有林胡、楼烦。’”^[9]

《战国策·齐策五》：“昔者，齐、燕战于桓之曲，燕不胜，十万之众尽，胡人袭燕楼烦数县，取其牛马。夫胡之与齐非素亲也，而用兵又非约质而谋燕也，然而甚于相趋者，何也？”^[10]

由以上史料可以看出，自战国时代起，“胡”字逐渐出现于史籍，虽然上引的史料如《战国策》、《周礼》有经汉人整理过的痕迹^[11]，但至少已表明了至迟战国中期起，“胡”字已开始用于称呼北疆的游牧民族。而一开始，它似乎并非是个专称，在某些民族的族名词尾也有胡

字,因为如前引的“东胡”、“豹胡”、“林胡”等皆有胡字,甚至《战国策·赵策二》中还出现了“参胡”及“以攘诸胡”^[12](此二语亦见《史记·赵世家》)的字句,说明了当时的胡似不只一种。

值得探究的是,历史上著名的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事件,其所谓“胡服”的“胡”,究系指那一种胡?此问题以往学界似未深究。一如顾炎武所考,胡字一开始的意思主要有三:一取象于牛胡;二为寿考之称;三与“何”字同义。为何称北疆民族为胡?他认为:

《史记·匈奴传》曰:晋北有林胡、楼烦之戎,燕北有东胡、山戎。盖必时人因此名戎为胡,而下文遂曰:筑长城以拒胡。是以二国之人而概北方之种,一时之号而蒙千载之呼也,盖北狄之名胡,自此始。^[13]

顾炎武所言之“二国之人”似应为“林胡”及“东胡”,言下之意“胡”字的来源是出自于此二者。但问题出在此二者之名皆以胡字为词核,胡字之意义为何?仍未得到解决。

“胡”字第一次在没有连用的情况下单独出现,较可考者应是前引《战国策·齐策五》之“昔者,齐、燕战于桓之曲,燕不胜,十万之众尽,胡人袭燕、楼烦数县。”^[14]燕、齐此次的“桓之战”,据徐中舒考订实即发生在燕昭王二十年(公元前295年)时的“权之战”^[15](见《战国策·齐策二》)。因此“胡人”及“胡”字可能在此之后已有单独使用的情形发生。不过考虑到《战国策》系西汉刘向所掇辑而成,其用词不免有刘向之“习用语”成分,此处可持保留态度。

《史记·赵世家》曾记载了赵武灵王的一些对话:

召楼缓谋曰:“我先王因世之变,以长南藩之地,属阻漳、滏之险,立长城,又取藺、郭狼,败林人于荏,而功未遂。今中山在我腹心,北有燕,东有胡,西有林胡、楼烦、秦、韩之边,……吾欲胡服。”……于是肥义侍,王曰:“简、襄主之烈,计胡、翟之利。……今吾欲继襄主之迹,开胡、翟之乡,而卒世不见也。”……王曰:“世有顺我者,胡服之功未可知也。虽驱世以笑我,胡地中山吾必有之。”于是遂胡服矣。^[16]

这些对话中有两点值得注意:其一,东有胡的“胡”是否为东胡?其二,林人与林胡是否指的是同一个民族?之前提到,在《战国策·赵策二》及《史记·赵世家》都曾提到“三胡”的名称。对此,《索隐》注:“林胡、楼烦、东胡,三胡也。”此三胡名称出现于匈奴之前,顾炎武似据此认为胡字的用法是始自于此三者。

二 东胡与胡之关系

关于东胡之名的来源,《史记·匈奴列传》中曾提到:

当是之时,……而晋北有林胡、楼烦之戎,燕北有东胡、山戎。

《索隐》引服虔云:“东胡,乌丸之先,后为鲜卑。在匈奴东,故曰东胡。”^[17]

服虔为东汉末年时人,去古未远,其说当有一定程度的可靠性^[18]。若依服虔的解释,则“胡”字为名词,“东”为形容词^[19]。吕思勉曾指出:“然则东胡者,吾国人 匈奴之名以名之,而加一方位以为别,犹称西域诸国曰西胡尔,非译名也。”^[20]显然东胡之名是先由于有一个名为“胡”的国家或民族的存在,而该族则因位居“胡”之东方,乃得“东胡”之号。韩嘉谷先生认为:东胡是一支在被齐桓公征伐过的山戎土地上崛起的一个新部落同盟,其联合了山戎、孤竹诸部之遗民,和西部的胡人(白狄)部落并峙东西。对于这样一个新的集团,用其中原先任何一个部族的名称都不适合,于是采用了相对于西部胡人部落的名字,被称作东胡,服虔的说法正是此意^[21]。然也有人认为战国时东胡非指一族,实际上是北方少数民族总称^[22]。至于东胡的位置,《山海经·海内西经》云:“东胡在大泽东。”《广韵》引《前燕录》云:“昔高辛氏游于海滨,留少子厌越以居北夷,邑于紫蒙之野,号曰东胡。”^[23]有学者认为此大泽即达赉诺尔(呼伦湖),说明东胡的活动地域在今呼伦湖以东^[24]。东胡是否可以等同于胡,之前学界似认为应无疑义。然若细读《史记》的相关记载,此种学界成说似值得商榷。

一般学界会普遍把东胡等同于胡,实出自《史记·匈奴列传》的一条记载:

其后有燕将秦开,为质于胡,胡甚信之。归而袭破走东胡,东胡却千余里。与荆轲刺秦王秦武阳者,开之孙也。燕亦筑长城,自造阳至襄平,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郡以拒胡。当是之时,冠带战国七,而三国边于匈奴^[25]。

学者在阅读此段史料时,通常都直觉解读为:秦开先是在东胡当人质,归国后反而袭破东胡,令其退却千余里^[26]。但我们也可尝试做以下的这种解读:秦开先是在“胡”这个国家当人质,后来可能是在那边学习了较为先进的骑射战术,因此归国后马上运用此新战技,一举击败了宿敌东胡。手豕隆义曾指出:当时东胡、胡、燕为并立的三股势力,但东胡最强。因秦开甚为胡人所信,故燕的击破东胡,乃是胡人在其背后直接或间接支持的结果^[27]。此种解读似乎更具合理性,因为从前后文来看,后来燕国也筑了长城而拒“胡”,显示燕国与胡仍然毗邻,这个胡是哪个国家呢?引文最后一段明白告诉我们燕、赵、秦三个冠带之国是“边于匈奴”。

要做这样的解释,必须先证明燕国当时确有可能同时与胡、东胡这两个国家接壤。而考燕国之疆域,《战国策·燕策一》云:“燕东有朝鲜、辽东,北有林胡、楼烦,西有云中、九原,南有呼沱、易水,地方两千里。”^[28](《史记·苏秦列传》所载亦同)依据王恢先生的研究,“燕地初有今河北沧州以北,滦河以东河北之境。其后拓及察哈尔长城以南,东北有整个辽河流域,及于朝鲜平壤之境^[29]。”即约略是今河北北部,辽宁西南部,并兼有山西的东北隅^[30]。顾颉刚也指出燕原居赵之北境,凡九原、云中、雁门皆本燕地而赵夺之。主父致楼烦王之兵,即是掠夺燕之藩属^[31]。故燕国的疆域确实与今内蒙古一带接壤,故当时秦开质留的“胡”,不能排除是楼烦、林胡甚至匈奴的可能性。又《说苑卷一·君道》:“燕昭王问于郭隗曰:‘寡

人地狭人寡，齐人削取八城，匈奴驱驰楼烦之下。’”^[32] 据此，当时匈奴确已迫近燕国边境之楼烦，故燕昭王出于外患忧虑乃有此语。由于秦开为质于胡的这件事似仅见于《史记》，因此缺乏其他的史料可与之比对。反观我们若仔细检阅《史记》其他的相关记载，便会不难发现在大部分的情况下，“胡”与“东胡”是二非一。公孙燕先生亦认为：“入汉以来，文献所载的大部分族称，都可以循明确指，其各自的族属、族源的关系不再像先秦那样难求明了。因此，在史汉书中不仅“胡”与“东胡”有明确分别；而且就是夫余、濊貉和乌桓、鲜卑诸称，也向不通用。”^[33]

《史记》中，仅《赵世家》有一例显示东胡被称为胡。即前引之“今中山在我腹心，北有燕，东有胡，西有林胡、楼烦、秦、韩之边”，该传稍后云：“自常山以至代、上党，东有燕、东胡之境，而西有楼烦、秦、韩之边。”^[34] 除此之外，其余谈到东胡的部分从上下文的语境来看，并未有类似的东胡、胡交替使用之情况。如同样是《赵世家》“二十六年，取东胡欧代地”^[35]，《廉颇蔺相如列传》所载“李牧多为奇阵，……破东胡，降林胡”^[36]，《张释之冯唐列传》所指“当是之时，匈奴新大入朝，杀北地都尉印，上以胡寇为意，……，是以北逐单于，破东胡，灭淡林。”^[37] 此处虽出现胡，但显指匈奴。虽然依《史记·匈奴列传》书写的语意来看，秦筑长城所拒之“胡”者似为义渠，赵筑长城所拒之“胡”者为林胡、楼烦，燕筑长城所拒之“胡”者为东胡或胡^[38]。看来似乎暗示义渠、林胡、东胡等三者皆为胡，而此三者又等同于匈奴。然而很明显的，匈奴并非等同于东胡、义渠与林胡，虽然此三者后来都有部分人民并入了匈奴，但不代表它们与匈奴是同一个民族。造成这种错乱的原因可能有二：一是在司马迁的认知中，此三者与匈奴为同一民族。但根据《史记》中其他部分的记载以及参照不同的史籍记录，此种可能性相当低。可能性较高的应是第二种情况，即胡字在战国晚期的使用仍未十分明确化，它可能有大部分的情况指的是某一族类，特别是北狄系的民族，但偶尔还是有指与北狄系民族相邻的其他族类情形出现。在像赵国北部这样一个多民族交错的地区，此种情况特别明显，因此《史记·赵世家》才会有“而襄王并戎取代以攘诸胡”^[39]的记载。

三 林胡、豹胡与胡之关连

与东胡相较之下，《史记·赵世家》中“林胡”与“胡”相等同的至少有二例：

（一）“二十年，王略中山地，至宁葭；西略胡地，至榆中，林胡王献马。……代相赵固主胡，致其兵。”^[40] 此处的“胡”、“胡地”应为林胡无误。

（二）“主欲令子主治国，而身胡服将大夫西北略胡地，而欲从云中、九原直南袭秦。”^[41] 此处言“西北略胡地”，也应指林胡。

此外《史记·赵世家》中尚有一例“胡”，也极可能指的是林胡。“二十一年，攻中山，赵祚

为右军，许钧为左军，公子章为中军，王并将之，牛剪将车骑，赵希并将胡、代。”^[42] 此处的“胡”，应也是已降于赵的林胡，故赵将才能领胡兵共击中山。因此若以胡名所指的对象来看，显然“胡”一开始指林胡的例子是高过于指东胡。

在李牧之世，匈奴与东胡、林胡等是并存的。《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李牧多为奇陈，张左右翼击之，大破杀匈奴十余万骑。灭襜褴，破东胡，降林胡，单于奔走。其后十余岁，匈奴不敢近赵边城。”^[43] 此处将匈奴与东胡、林胡并列，足见三者部族之不同。值得注意者尚有“襜褴”这个部族。《史记·匈奴列传》曾提到：“而晋北有林胡、楼烦之戎”。《索隐》：“如淳云：‘林胡即儋林，为李牧所灭也。’”^[44] 不过前述《李牧列传》中却将两者并列，显有矛盾。对此，马长寿认为“林胡”一词乃战国和汉代人士行文之简称，其原名当为“儋林”或“襜褴”。他举《史记》和《汉书·冯唐传》并云：“李牧北逐单于，破东胡，灭儋林。”的记载，认为《冯唐传》乃冯唐转述其祖父之词，当较《史记·李牧列传》所述较为可信。他又据《汉书·冯唐传》注引郑氏云：“匈奴传曰，晋北有澹林之胡，楼烦之戎也。”指出“林胡”实系“澹林之胡”之简称。而“澹林”、“襜褴”、“狄历”又同初一语源，皆由“Türk”一语翻译而来，即“澹”、“褴（按：应为儋）”、“狄”都是“Tü-”的对音，而“林”、“褴”、“历”都是“-rk”的对音，因此林胡为北狄或北狄之一种应无可疑^[45]。徐中舒的看法与马长寿类似，他认为林胡之林本应读如儋林二音，仍为狄历、丁令之异译^[46]。省称林胡者，既译其音，兼明其义，襜褴亦为儋林之异译。顿嵩元还指出另两种有关何谓林胡的说法。一是《资治通鉴》注曰：“余谓此胡种落依阻林薄，因曰林胡。”二是《尔雅·释地》曰：“邑外谓之郊，郊外谓之牧，牧外谓之野，野外谓之林。”是以“林”即野外之称。故林胡可解释为“离中国（中原）远方的野外之胡人”。^[47] 小川琢治更进一步指出淡林或与《汉书·地理志》云中郡之“桢陵”通音，林胡或与《左传·襄公十四年》所提到的“械林”及《山海经·海内北经》的“林氏国”有关，从现今仍存的地名“榆林”来看，此区之前应有明显之森林，这可能是林戎、林胡等族名之由来^[48]。

林胡与楼烦一开始是被称为“戎”而非“胡”（见前引《史记·匈奴列传》），楼烦之东境似达到今河北西北部，即燕楼烦数县之地。其中部在今晋西北一带。其西部则包括今内蒙的南部，即今伊克昭盟一带^[49]。从历史上看，一个新族称出现，往往旧称尚在^[50]，因此司马迁的这种叙述包含两种可能性：一是林胡、楼烦之前是族类是属于“戎”的；另一种可能性是在司马迁的观念中，戎与胡的概念几乎相同。目前我们尚无法判断司马迁对戎狄的叙述中，哪些是属于先秦时期的习惯用语，哪些是汉代的用语，因为司马迁很可能在不觉中，用汉代的观念习用语去描述先秦时期的族类，这就造成后人研究时极大的困扰。不过楼烦与匈奴似非同族，前引《说苑》卷一《君道》有“匈奴驱驰楼烦之下”^[51]一语，可见楼烦与匈奴在战国末实为二国。

《逸周书》中还提到了“豹胡”。《逸周书·王会·伊尹朝献篇》：

正北空同、大夏、莎车、姑他、旦略、貌(豹)胡、代翟、匈奴、楼烦、月氏、嬖犁、其龙、东胡,请令以橐驼、白玉、野马、良弓为献。^[52]

孙诒让以为“豹胡”疑为《墨子》卷四“非攻下”所提到的“不著何”^[53],张博泉先生从孙诒让之说,认为豹、不;胡、何为一声之转^[54]。吕思勉亦认同豹胡亦即不屠何^[55]。但冯家升认为不屠何实即屠何,为东胡之别名^[56]。顾颉刚同意白鸟库吉之说,认为“不”字于乌拉阿尔泰语系中具有“都城”之义,商代之都曰亳,恐源于此^[57]。因豹胡留下的记载不多,学界目前似无进一步的研究。

四 早期中国文献中的胡、貉并举现象

当战国文献开始出现“胡”的记载之际,作为族名的“貉”(貊)便经常与胡字连用,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

《荀子·强国篇第十六》:“今秦南乃有沙羨与俱,是乃江南也;北与胡、貉为邻。”^[58]

《墨子·兼爱中第十五》:“古者禹治天下,……洒为底柱,凿为龙门,以利燕、代、胡、貉与西河之民。……蛮夷丑貉,虽有周亲,不若仁人。”^[59]

《墨子·非攻中第十八》:“虽北者,且不一着何,其所以亡于燕、代、胡、貉之间者,亦以攻战也。”^[60]

《管子·小匡篇》:“擒狄王,败胡貉,破屠何,而骑寇始服。北伐山戎,制令支,斩孤竹而九夷始听,海滨诸侯莫不来服。西征,攘白狄之地,遂至于西河,……逾太行,与卑耳之貉,拘秦夏,而秦戎始从。”^[61]

《吕氏春秋·孝行览第二·义赏》:“民之讎之若性,戎、狄、胡、貉、巴、越之民是以,虽有厚赏严罚弗能禁。”^[62]

成书于汉代之《战国策》,也可见胡貉并举之例:

《战国策·秦策一》:“苏秦始将连横,说秦惠王曰:‘大王之国,西有巴、蜀、汉中之利,北有胡貉、代马之用。’”^[63]

貉与华夏接触的时间较早,西周时期周人即与貉有过接触。有关秽貉民族的史料,最早提到的怕要算金文里的“貉”,甲骨文里似找不到“貉”。在周金文中有“貉子卣”、“白貉卣”、“周貉簋”等器,虽未能断定其属于貉民族,但可能与貉民族有某种关系^[64]。关于貉族,古代亦称为“貉”。有学者认为貉族属北狄,有人认为应属夷人^[65],高句丽亦属貉种^[66]。蒙文通曾主貉即山戎^[67],也有学者认为貉是通古斯的一种^[68]。芮逸夫先生也曾指出在山东之南滨海之处,当东周时尚有貉人^[69]。貉又作发,先秦时期有名为“北发”之族国,发与貉声近,可能是貉的异称^[70]。《左传·昭公九年》:“肃慎、燕、亳,吾北土也。”之“亳”,有学者认为也是

貉之同音异写^[71]。另外陈硕甫《毛诗传疏》认为《诗经·大雅·韩奕》中有“其追其貉”一句，追、貉音相近，疑追即貉^[72]。有关“貉”的发音，文崇一认为所谓“秽”与“貉”，多半是华夏族人们的音译，其实貉之为貉，可能是一个部族的番号，其发音为“mai”^[73]。和田清认为貉发音为ばく^[74]，许宪范先生亦认为“貉”音为“Bak”或“Baek”^[75]。韩国学者李丙焘认为，貉被古代日本人称作 koma，即是熊^[76]。也有人认为“貉”之本义是指一种野兽，这种野兽外形似狐，毛棕灰色^[77]。更有学者以为貉当即突厥文“Bökuli”之音省^[78]。

那珂通世则认为“貉”如“夷”，用来作为四夷的泛称，但此称在秦汉以后被滥用^[79]。三上次男认为胡貉之所以习用，可能是当时胡与貉的住地是在同一方向，而导致的一种概括性用法，同样的逻辑也可在“秽貉”、“韩秽”等习用词上发现^[80]。何光岳先生认为胡与貉亦是相邻而居的民族，故胡貉亦往往连称^[81]。貉原分布于今山陕至东北地区南部，西周时曾经为猓狁所逼而东迁^[82]。至春秋时，大部分涌入燕北及东北南部，形成燕国“北(外)迫蛮貉”^[83]的形势^[84]，舒大刚先生认为秽貉的第一次大迁徙，当发生在殷末周初。特别是燕人的扩张政策，促成了秽貉族的四散迁转。其北逃者，一支窜至燕国北方的燕山地区。其西迁者，趁殷朝初灭、河内空虚之机，迅速进抵今陕西北部地区。这部分貉族在西周中后期，由于猓狁和狄人的相继东进，一支被逼往北远徙河套地区和今山西北部，与后来的胡人杂处，史称“胡貉”^[85]。这在文献上颇有反映：

《诗经·大雅·韩奕》：“以先祖受命，因时百蛮，王锡韩侯，其追其貉，奄受北国，因以其伯。”郑笺注：“貉也，为猓狁所逼，稍稍东迁。”^[86]

从前举《诗经·大雅·韩奕》、《荀子·强国篇第十六》、《战国策·秦策一》等文献中可看出先秦时西河之地有貉族居之^[87]，貉于西周时还曾一度在周人活动区域附近生活。文崇一先生指出，在汉初，中国的北疆(陕晋冀之北)以及黄渤海沿岸(包括朝鲜半岛)都有他们的足迹。西北的貉民，也许跟其他地区的貉一样，本来就住在那里^[88]。孙进己先生认为：记载秽、貉在西的资料和记载秽貉在东北的资料，两者是属于同一时间的。这些资料只能说明秽和貉的分布从西到东相当广阔，并不能证明秽貉是到春秋战国时才东迁。东胡、山戎和秽貉不是一族，顶多有可能在源流上有一定联系。秽貉语应属于蒙古语族，貉应和东胡、室韦等属同源，因此貉族有可能是从西向东迁徙，但东迁的时间却相当早^[89]。然也有学者不同意这种看法，认为貉一直生活在东北，并未扩张至西北地区^[90]。三品彰英则主张所谓貉族的东渐仅是文献上“貉”字用法的东扩，貉族本身并未东移^[91]。总之，自西周末至春秋初期，貉族已散居在北方各地，其大部分居住在河北近燕地域，另一部分则西迁至山西北部的西河一带^[92]。

《逸周书·夏官司马·职方氏》中有“四夷、八蛮、七闽、九貉，五戎、六狄”^[93]之语，可见貉之种类不少。而貉在战国时仍活跃于秦之北方，在“胡”字尚未成为北族名称时，“蛮貉”经

常并举^[94]。如：

《论语·卫灵公》：“子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95]

《诗经·鲁颂·宫》：“淮夷蛮貊，及彼南夷，莫不率从。”^[96]

即使胡出现后，成书于汉代的文献仍不时提到貊族(国)：

《说苑》：“晋文公伐卫，……文公惧，还师而归。至国，而貉人攻其地。”^[97]

《周礼·秋官司寇·貉隶》：“貉隶，掌役服不氏，而养兽而教扰之，掌与兽言。”^[98]

《白虎通·卷三·礼乐》：“言夷狄者，举始终也。言蛮，举远也。言貉，举恶也。”^[99]

《说文·豸部》：“貉，豹属。出貉国。”^[100]

《说文·鱼部》：“鲜，鲜鱼也。出貉国。”^[101]

蒙文通认为在秦灭义渠之后，春秋时居北方之异族惟貉与狄^[102]。又《史记·赵世家》载：“襄子齐三日，亲自剖竹，有朱书曰：‘余将赐女林胡之地，……奄有河宗，至于休混诸貉。’”^[103]可见当时赵国之貉族集中在休混一带，故云“休混诸貉”。钱穆认为休混诸貉应在介休、离石一带，河汾之间，河宗盖指龙门以上^[104]，但何光岳先生认为休混即休屠泽，即今内蒙古额济纳旗北的居延海，貉人的一支曾向西北迁至此地^[105]。《说文·豸部》：“北方貉，豸种也。”^[106]则仍将貉至于北方。

五 胡与貉(貊)之关系

关于胡与貉之关系，究系两个不同的族群，抑或是同一个概念之不同泛称？学界有不同之看法。三品彰英指出：貉(貉)在先秦文献的用法中，是被惯用来作为北方民族之泛称，《周礼·夏官职方氏》中曾有“四夷、八蛮、七闽、九貉、五戎、六狄”的记载，是以貉的内部应含有多种族类，从胡或秽曾被称为“胡貉”、“秽貉”的用法来看，此二者当时都只是“貉”当中的一种^[107]。因此在“胡”出现之前，“貉”字曾是北族之泛称。吴荣曾先生认为：从春秋末到战国，北方游牧民族被称为胡，也可称为貉，或者是胡貉连称。战国时期胡与貉不仅常见，而且两者也可相通。但严格地说，戎狄和胡貉又是有差别的，如《周礼·职方氏》提到的各族，共有夷、蛮、闽、貉、戎、狄六种，可见貉和戎狄有区别。在《秋官》中有蛮隶、闽隶、夷隶、貉隶，惟不见有戎隶、狄隶。从此似反映出，戎狄已衰微，在王宫中服役的北方各族以貉族人为主，这和战国时的情况正相符合。貉人大致分布在今河北北部，辽宁和内蒙古东部以及西部、南部一带^[108]。

若依《诗经》及郑玄之说，貉之所以后来出现于东北，系受 貉之压迫所致，而未迁之貉族渐渐融入匈奴之中，故史书才以“胡貉”连称泛指北方的少数民族^[109]。林澧先生认为：胡和貉连举是在较晚的战国时代才出现的现象，是因为都处于北方而相提并论。此用法到汉

代之所以更加流行,是因为中原的文人对北方各族缺乏实际知识,把一切北方民族都想象为同一经济类型和文化面貌的大族团。“胡貉”显然是说的匈奴,所以文中又把“胡貉”省称为“胡”^[110]。公孙燕先生也有类似的想法,他认为所谓的“胡貉”,实即胡族之属^[111]。吴荣曾先生也同意战国时的胡貉,是对北方畜牧民族的泛称。而胡貉包括了东胡、林胡、楼烦、匈奴^[112]。蒙文通更直指“胡”实为“貉”,盖因貉之族有林胡、东胡,而胡之名遂代貉而起^[113]。但也有人认为胡貉应该指的是东胡^[114],考古学者还进一步将貉族与东北亚系青铜文化联系在一起,推测分布在辽西与辽河平原以短茎组合柄形铜剑为特征的这支青铜文化系统,应是先秦时期貉人所创造的文化^[115]。

日人和田清的看法值得参考,他认为貉之地望在燕之北,即今热河方面。周初时,貉应延伸至热河更西方的山西北部、陕西东北一带。貉本来就在中国北方,划分今日中国北部平原与蒙古高原的山脉一带,以前充满着浓密的森林,貉有可能是通古斯系的森林住民,后来受到北中国的农业民族或蒙古游牧民族的压迫,一部分被屈服同化,一部分则退往满洲的山地。狄是在河南平原发展的中国人最先接触到之山地住民,随着狄的逐渐中国化,才又遇见在其背后的貉^[116]。河田清的意见与林澐先生的“戎狄非胡”说概念有相通之处,林澐先生举体质人类学上的材料,认为戎狄与后来的胡在人种上存在着不同的来源,戎狄与华夏之民相同,是东亚蒙古人种,而胡则属北亚蒙古人种^[117]。

貉与胡的关系同貉与戎狄的关系类似,可能与民族的接触及迁徙有关。日人小川裕人认为貉族在人种学上是以通古斯族为主而混入一些蒙古族的血液^[118],那波利贞曾主张中国人之所以将塞外人称作“胡”,是来自于先秦古国“虞国”,像蒲、薄、亳、虞、吴、傅、胡等,皆为同音之异译^[119],林澐先生亦认为貉、亳、蒲古音都是锋部唇音字,故可通假^[120]。亳若同于貉,则胡与貉之关系当更进一步。

小川裕人与王建新先生均指出:貉族的民族性近于富狩猎性、好战、喜寇抄的游牧民,应与西方的骑马民族有某种关系^[121]。胡可能如河田清所言,是生活于更接近外蒙古地区的族群,他们应是较早期进入游牧生活的北方人群,貉因与胡较早接触,习得某些游牧文化,华夏民族即是透过貉接触到了游牧文化的概念。后来貉因受到华夏或胡的压迫而逐渐愈往东迁徙,胡遂往南发展占据了代北一带原由貉族所盘据的地域,也因之与华夏诸国发生了直接接触的情况。最后貉族退出内蒙古东部,胡完全取代貉而成为北方游牧民族的代表,由汉初貉人曾发兵助汉一事来看(《汉书·高帝纪》:“北貉、燕人来致泉骑助汉。”^[122]),貉人退出中国北方转往东北,极可能是由于匈奴冒顿单于的扩张。从胡服与貉服之替代关系,可稍窥胡貉之兴替^[123]。

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是中国史上一件学习外来文化的重要历史事件,自此中国华夏诸国开始将骑兵运用于战场^[124]。但是其所学习的胡服似非直接由胡人习得,而是透过貉族。

《水经·河水注》引《竹书纪年》：“魏襄王十七年，邯鄲命吏大夫奴迁于九原，又命将军、大夫、适子、戍吏皆貉服。”^[125]

蒙文通据此以为貉服即胡服，主胡人即貉人^[126]。吴荣曾先生认同此种看法，以为赵之胡服实习自与其毗邻的貉人^[127]，王建新先生亦认为胡人与貉人都是骑马民族，从先秦文献经常提到貉人这点来看，中原人与貉人的接触频繁，战争也不少^[128]。《竹书纪年》之记载反映了这样一种可能性，即战国时赵武灵王下令改穿之服装实为貉服，只是后来貉的概念为胡所取代，故《史记》中司马迁才改“貉服”为“胡服”。因此早期中国对于胡之概念，有可能是经过了貉的过渡才逐渐成形的，其过程为：“貉”→“胡、貉”→“胡”。

六 “胡地”概念的出现

其次要厘清所谓的“胡地”是否有特定之范围。“胡”除了代表北族之外，同时也代表了某种地理概念。

《史记·赵世家》：“王曰：‘世有顺我者，胡服之功未可知也。虽驱世以笑我，胡地中山吾必有之。’于是遂胡服矣。”^[129]

在此文中，中山被称为“胡地”，若此，则显示白狄人被视为胡类。但也有不同的断句方式，如缪文远先生就将此句断为“胡地、中山吾必有之。”^[130]

《战国策·赵策二》：“肥义侍坐，曰：‘王虑世事之变，……计胡、狄之利乎？’王曰：‘……今吾欲继襄主，启胡、狄之乡。……’……自常山以至代、上党，东有燕、东胡之境，……变服骑射，以备燕、三胡、秦、韩之边，……以攘诸胡。”^[131]

匈奴在东汉应劭的眼中被归类于“狄”，《风俗通义·佚文·四夷》：“北方曰狄者，……其类有五：一曰月支，二曰濊貊，三曰匈奴，四曰单于，五曰白屋。”^[132]但此处将匈奴与单于并列，二者明是一非二，应劭将之明分为二类，未知何故。他还认为“胡”或“狄”都是山戎之别种，《风俗通义·佚文·四夷》：“胡者，谨案：《汉书》：‘山戎之别种也。’，又胡者，互也，言其被发左衽，言语贄币，事殊互也。殷时曰獯粥，改曰匈奴。楼烦，故楼烦胡地也。《春秋传》曰：‘狄本山戎之别种也，其后分居，号曰赤翟、白翟。’”^[133]应劭的看法似支持了这样的一种概念：即汉人认为胡地起初是指晋北靠燕山一带的地域。这是否暗示最先被称作“胡”的民族，就是活动于这附近的地域。从前引《墨子·兼爱中》与《墨子·非攻下》的记载中，屡将燕、代、胡、貉并举一事来看，暗示至迟在战国之世，当时华夏民族所接触的北疆异族主要活动于此。

下迄汉代，胡地仍与代相连出现：

《盐铁论·卷二·论儒》：“御史曰：‘……故马效千里，不必胡、代；士贵成功，不必